

山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文丛

导论

关于文艺学定义的几点辨析

20世纪以来我国文艺学发展的启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文艺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从走向世界文学的进程来看现阶段的中国文学

20世纪世界文学理论概观

注重作家方面的表现、理论

注重作品本体的形式、理论

注重读者方面的接受理论

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特点和趋向

中国文学理论所面临的选择

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发展道路的回溯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历程的反思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启示

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文学意象论

文学本性界说

意识形态说辨析

阶级斗争工具说探源

意识形态本性论剖述

摹仿说、形象认识说漫评

情感表现说再评价

结论

文学的审美本质

文学与反映论

人对现实的艺术掌握

人对现实的艺术掌握的基本特征

审美意象系统

意象考辨

审美意象的静态分析

审美意象系统的动态结构及其类型

夏之放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增订本)

山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

学术文丛

文学意象论

(增订本)

夏之放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意象论 / 夏之放著. — 增订本. —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209-10387-9

I. ①文… II. ①夏… III. ①文艺美学 IV. ①I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1079号

文学意象论(增订本)

夏之放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70mm×240mm)
印 张 21.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10387-9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刘叔成

在《文学意象论》即将出版之际，有幸读到它的手稿。夏之放同志在这本新著中表现出来的学术勇气和治学态度，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历史证明，文学一出现于人类社会，人们就力图从各种角度对它的特质作出概括。西方的“摹仿说”“表现说”“直觉论”等等是这样，我国的“言志说”“载道说”等诸种学说也不例外。进入20世纪以来，关于文学特质的种种理论，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80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之风，西方的文艺美学思潮大量涌入，在一段时间里，“自我表现说”“精神分析论”等都曾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总之，人们探求文学的特质，却难免陷入迷茫，所以，在文学特质的问题上，要攀登科学的顶峰并不容易。

(一)

夏之放同志的《文学意象论》，广泛地考察了前人有关文学特质的诸种见解，特别是针对我国文艺界长期以来普遍以“形象”作为标示文学艺术特征的中心范畴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当把“审美意象”作为文艺学—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并据此得出了“文学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审美意象系统”的结论（第四章）。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一种学术主张。

第一，“形象说”来自19世纪俄国文艺美学理论，虽然也接触到了文学的审美特质，肯定了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区别，但它突出强调的只是文学艺术形式上的特点。别林斯基曾经反复论证，文学同哲学社会科学面对的是同样的内容、对象，只是前者用形象、图画来“显示”，后者用逻辑推理的“三段论法”来“证明”。这对于揭示文艺审美特质的局限，是不言而

喻的。

第二，概念的内涵虽然可以随着人们的认识，以及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充实、丰富，但就“形”与“象”本身而言，它所表示的毫无疑问是事物的客观形态与象貌；因此，尽管不少理论家从文学艺术的实际出发，强调“形象”概念本身，却往往使人忽略了它所蕴含的主观方面，从而陷入文艺上的机械论。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曾着重强调：“只有通过心灵而且由心灵的创造活动产生出来，艺术作品才成其为艺术作品。”^①这一真理，用“形象”的概念很难科学表述，而用“意象”的概念，则能正确地加以揭示。

第三，把“审美意象”作为文艺学—美学的逻辑起点，有利于全面继承、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艺美学成果。如果说，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摹仿说”注重的是文艺的客观方面的话，那么西方的“表现说”“直觉论”等则体现了对文艺创造主观方面的意识；至于我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可以说恰恰是以肯定文学艺术家的主观情思，把握客观世界中的决定作用为其特色的，唐代画家张璪的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这一理论最深刻、最简洁的概括。所以，“审美意象”的提出，使我们可以全面地清理前人的理论建树，消融一切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

第四，《文学意象论》的根本价值，自然主要不是因为它提出了要以“审美意象”作为文艺学美学的逻辑起点，而是在于确定这一基本观点之后，对“审美意象系统”以及文学用语言创造的审美意象的各个层面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见第五至九章），这对于揭示文艺的审美特质，促成我国当前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绝对真理只存在于相对真理的长河之中。夏之放同志在他的《文学意象论》中，没有也不可能对有关文学审美特质所有问题一一作出科学的解答，他的某些论述不过是他个人的见解，是否真正科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学者们的批评、指正。

（二）

《文学意象论》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与运用上，也给人留下

①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47页。

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首先，在考察文学艺术现象时，夏之放同志既不是像古代某些大师那样，把文艺活动归结为“神力的凭附”或单纯的个人心灵的“自我表现”，他指出了文艺活动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依赖，并且把理论阐释的重点放在人类社会生活怎样才能化为作家艺术家的情思、化为文学艺术中的审美意象上。例如，在对本书的中心范畴“审美意象”的论述中（见第六章“审美意象系统”），他不仅考查了“意”“象”概念的历史渊源，而且对“审美意象”作了静态的分析和动态的解剖，他合理地论证了“表象”与“意象”的区别，强调意象的形成对于人们情意活动的依赖，他说：

按照“象”的成分的来源和性质的不同，我们把审美意象分为即时审美意象、象征性意象、想象意象和幻想意象。但所有这些“象”有一共同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已不是客观事物的物理现象（物象），而是主体的心理现象（心象），是意中之象，是渗透了主体的理解（意义、意念）、情感（意味）和行动倾向（意志）的“象”。在意与象的融汇结合之中，决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意”（主体方面）始终占据着支配地位、主宰地位。正是这一点，才使意象高于一般的认识表象、记忆表象而成为具有新质的东西，成为创造性想象的光辉成果。由此我们才说，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中所展示的都是一种通过创造性想象而虚拟的艺术世界，是一种虚幻的天地。

显然，这一结论得出，是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文艺实践的结果。

其次，在全书具有总体意义的前半部分，在论述意识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社会与自然、真理与价值这样一些哲学基本问题时，之放同志能够牢牢地把握住客观实际，区分各个相近的概念的不同内涵，从而澄清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与误解，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事物的生命在于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同人类实践的密切联系，从实践中获得生命之源，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僵化的理论绝不

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马克思主义遭到了严重的歪曲，被当成是僵化的教条，什么“句句是真理”“两个凡是”等等。在本书中，之放同志尽力理清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及文学艺术的基本观点，扫除那些被强加在马克思主义头上的东西。且看一个小小的例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对于文学艺术的冲击，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庸俗文学的泛滥，曾被有的人目为“艺术的堕落”。对此，之放同志作了这样的论述：“文本作为作家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必然因包含审美价值而具有社会教育价值，同时它作为商品也必然具有交换价值或称票房价值。书刊的审美教育价值是依附它的交换价值而实现的。没有人买和读的书，当然是无法实现和发挥它的社会效益的。……过去对于‘票房价值论’的批判和对于经济主义的讨伐，唤起了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义利观’的回忆，从而把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复辟联系起来，甚至在文学领域实行‘无价值主义’，造成一种讳言经济效益的不正常舆论，从而极大地限制了经济价值规律对文学生产的作用。”（第一章）这些中肯的意见，我认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魂。

再次，在全面汲取人类理论建树的积极成果上，表现了以马克思主义消融一切的伟大气魄。列宁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的文化专家的人所能杜撰的，它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合乎规律的发展。《文学意象论》不仅对古往今来有关文学艺术的种种学说，采取了消化吸收的态度，而且还广泛地借鉴了世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全书的“代前言”从“人类面临着的第三次文化的高峰”着眼，高屋建瓴，把文艺学—美学的建构，放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上，这无疑增强了全书时代色彩。

（三）

作为一本概括文艺理论成果、富有新意的著作，《文学意象论》在理论的阐发、材料的收集、体系的建构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是一本认真严肃而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书。作者开宗明义声明：

本书是在这种争论的背景下酝酿和写出的，力图参照中国传统文艺学美学术语来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因此，本书不得不以较多的篇幅来展开论述为什么要以审美意象作为逻辑起点，为此又不得不以较多篇幅对古今中外已有的各种说法进行介绍、鉴别和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定以审美意象作为逻辑起点之后，则着重从审美意象本身的演进流程的角度，展开论述创作论、构成论及鉴赏论。……（第一章）

全书的写作，就是在作者的这一明确要求下实现的。这同某些意在引起轰动效应、故作惊人之语的“学术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赞同马克思的主张，科学上需要的是不畏险阻的艰苦攀登，而没有什么捷径，更不许弄虚作假。从这点讲，《文学意象论》体现出来的治学精神，值得提倡效法。

1993 年教师节于汕头大学

文艺学美学发展走向之我见

(代前言)

人类的文化、文学总是不断发展的。如何把握当今文艺学、美学的发展趋势，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文艺学、美学的系统观，值得我们做一番深入的探讨。下面谈一下自己的两点看法，以就教于同行与专家。

人类正面临着第三次文化高峰

我们知道，在人类文化史上已经出现过两次文化高峰。第一次文化高峰是在古代，东方是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为代表，西方是以古希腊文化，包括神话、戏剧、雕塑等为代表。这次文化高峰是以当时人们带有猜测性的对于世界的整体认识为其思想方法的特征的，或者也可以叫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次文化高峰至今影响着整个人类文化的走向。世界几大主要的传统文化，都是以这个时期的成就为其分野和标志的。

到了后来，西方经过了中世纪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开始了近代的文化高峰。在东方的中国，文化发展也有长足的进步，但不像西方那样典型。以文艺复兴为开端的这次文化高峰，其思想方法的特征是对世界的实证的唯物的认识，由原来认为神支配世界到人来支配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许多部分、许多领域进行了过细的形而上学的研究。例如我们熟悉的达·芬奇，他本身是科学家，又是艺术家，他设计飞机，又画画，还写文学作品。他在美术史上以对人体比例的研究著称于世，而他的人体比例是建立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之上的。牛顿的力学三定律，更是这种思想方法的代表性学说，带有形而上学的特征。今天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对于世界的这种认识了。但是，无可否认，这次文化高峰使人类文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表现在文艺领域，代表这种思维模式的是稍后出现的现实主义潮流。自然主义、印象主义等也与这种思想方法有关。

近来大家都感到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给人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冲击。20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不仅提出了自然科学的新课题，而且也提出了新的哲学问题、世界观问题。过去那种实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的发展了。数学领域，较早的微积分已经是辩证地对待数的法则，模糊数学、突变理论等新理论，在认识世界方面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原子模式，扩大了我们的视野。现在科学家已经研究发现几百种微粒子，像J粒子等，其寿命是很短的，是若干万分之一秒。由于对这些粒子的测定同我们人类测量它的手段有关，以至在物理学中提出了测不准原理。这实际上就是在认识真理的领域中，提出了主客体关系问题。在化学领域，出现了高分子合成，出现了新的人造的合成材料。生物学领域出现了遗传工程学，由此人类走向了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新塑造自然物种的新阶段。我国的童第周教授和他的学生美籍科学家牛满江关于鱼的研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有的科学家设想，要设计一种新的植物品种，上面结葵花头，叶子旁边结玉米穗，根上长土豆，秸子还可以榨糖，如能实现的话，我们人类的生活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甚至还有有的科学家幻想在人类的遗传密码里恢复我们鱼类祖先的某些成分，比如恢复腮的密码，那么，将来的人就不必学游泳而可以在水中生活。再如现代医学中的人的面部正畸问题，它涉及人类如何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己的形象问题。如果说哲学、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研究人生问题、人的问题，那么自然科学发展的冲击波已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20世纪40年代，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后来的新三论——协同论、突变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给整个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冲击力量。目前，国内一批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人，正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各方面人类文化的新的信息，想着来求取我们伟大文化的新发展。在思想方法上，这个新的动向有新的特点，就是在总体上反映了人类重新以新的系统观来观察世界。这一新阶段既不同于古代那种朴素的整体观带有猜测性，又不同于第二次文化高峰中的那种实证的、形而上学的、过细的、静态的研究，而出现了新的思维模式、新的思想方法。许多

人感到人类文化正在出现一种新的高峰征兆。可以设想在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人类文化将会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三次人类文化高峰从什么时间算起?这在国内外都是有争论的。有些人主张从老三论或新三论算起,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算起。有些人主张从20世纪算起。这些同志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19世纪出现的思想,已经过时了。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赞同以下这种观点,认为第三个人类文化的新阶段应从19世纪中期算起,具体说从1859年算起。因为1859年在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两部重要著作:一部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部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者以新的系统观来观察整个生物界,在彼此孤立的动物植物物种之间找到了同一的联系,用遗传和变异这对矛盾,解决了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过渡,使生物界从单细胞一直到高等生物的发展成了一个可以理解的系统、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这样就向人们提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后来出版的《资本论》,则是用这种新观点、新的思想方法来观察人类社会的科学著作,人们认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可以认识的、有规律可循的客观的发展过程。现在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有争论的。究竟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呢,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在美学界也有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好像两部分不统一。实际上它们是统一的。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正是为了解决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决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中心。马克思面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他要解剖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他才追根溯源地考察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之前,只能将人类社会理解为是神创造的,或是人的思想观念的外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建立,才把人类社会看成了一个可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过这样的话:“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

门科学。”^①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国内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马克思这一伟大的思想是很应该加以研究宣传并使之系统化的。他把自然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实际上看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人类对周围自然界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即自然科学的发展，恰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成果和产品。从根本上说，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不可分的。在以人类为本体的主体性发挥的历史过程中，二者完全统一起来了。我们知道，按唯物辩证法，物质的运动形态呈现为五大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社会运动。过去我们很少想这五种运动形式之间靠什么连接起来，彼此之间如何沟通。我觉得从马克思的思想里，就应引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运动形式的变化，还是社会运动形式，它应该是一个系统，用一个系统观、一个系统思想去解释它。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表述的一个思想，即一切事物实际上都是过程。“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②

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对世界的研究“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对这一思想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地理解和把握。以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阐述过的这一思想，对照一下后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至于再后来的量子力学、原子核的研究，甚至原子物理学的出现和测不准原理等都可与恩格斯的思想挂起钩来。我感到，如果说第三次文化高峰是以人对世界的整体系统观为思想特征的话，那么这个新阶段应该从1859年算起，以达尔文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黑体字都是本书原有。

这两大系统观学说为标志，已进入了这样一个新时代。现在也有人觉得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都是不能再新的理论。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和苏联则被说成是伪科学。实际上它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在世的话，两位革命导师会鼓掌欢迎自然科学的这种伟大的新进展。马克思的系统思想就是建立在细胞学说、达尔文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这样一些自然科学的新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他们能了解到相对论、量子力学这样一些自然科学的新的理论发现的话，他们会非常高兴地接受它们，并纳入他们的哲学体系中的。所以，我认为第三次文化高峰应该从这个时期算起。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这个文化高峰的一个标志性的思想武器。

这样，人类文化第三次高峰的到来，已经经过了一个阶段的酝酿。现在，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着一个作出巨大综合的任务。这里所说的综合，不是一般的综合，不是说这一学科跨到那一学科，而是总体的大综合，起码是跨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或者用我国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钱学森同志的观点说，把人类文化科学分成八大分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文学艺术、军事科学等八大学科^①——之间的大综合。在一波新的文化高峰中，就应该以这种对于多学科的横向巨大综合作为它的特征，使人类文化对世界的理解和对自己的理解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的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已投入了很大的关注，钱学森同志则是走在前面的探索者。也许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引起争论的地方，但他的这种理论探索的气魄和勇气足以使我们折服，他的设想已预示着人类发展的未来。我们完全可以循着这条思路进行富有价值的探究。

另一方面，从纵的综合来讲，它应该是人类几大文化的合流。现在，一

^① 钱学森同志在《关于思维科学》一文中，列表指出可以分为美学——文学艺术，系统论——系统科学，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人天观——人体科学，认识论——思维科学，数学学——数学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军事哲学——军事科学共八个分支，统一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统率。见《关于思维科学》一书第20页，又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增加了社会论——行为科学，提出把科学划为九个部分，搭九个桥梁。见《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般人认为世界是六大文化系统，过去说是四大文明古国、四大文化传统，其中有些文化中断了，发展得不充分。如今世界上比较引起人注目的是西方传统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随着比较文化、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现今合流的趋向已非常明显，比较文学的兴起，是这种文化合流的一个表现。比较文学实质上研究的是世界文学，是“地球村”的人类文学。世界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向，将来将会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学。因此，做出这个新的综合的人应是精通几个主要文化传统的人。所以毫不奇怪，现在西方很多有识之士对东方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出现了东方文化热。西方学者中有很多人在寻找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比如有人将现代物理学与东方文化中中国的道教、佛教，特别是禅宗联系起来，寻找现代物理科学的哲学背景与东方哲学的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靠实证实验，靠自然科学和精密计算得出来的结论，和东方禅学大师悟出的人生哲理，对世界的理解竟有那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说相对论的思想在东方以神秘主义外衣为特征的思想家那里已被表述出来了。这说明，人类——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面临着同一世界，在思考同样性质的问题，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他们最后得出的一些结论、一些想法，有它的一致性。东西方可以沟通，可以统一起来。西方人想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新的参照坐标，寻找新的文化背景作为自己的补偿。而在中国恰好也兴起了西方文化热。特别是经过一段封闭之后，这种西方文化热来势很猛，在青年人身上表现尤为突出。无可怀疑，将会有那么一批人，从横向上能够兼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各个文化科学的领域；从纵的发展上，可以打通世界主要的几大文化传统之间的壁垒，可以架设起新的桥梁，做出新的综合。而且我想对这个新的文化高峰可能做出新的贡献的人物也许由东方人来承担更合适一些。因为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和吸收是相当不易的。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熟悉东方文化传统，再接受和继承了西方文化传统，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就有可能做出新的综合。例如我国理论界、美学界像钱钟书、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就带有这种性质。他们所做的尝试性的工作都启示着我们做出新的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文化高峰可能正是以这种巨大的综合作为它的特征，以新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系统观

来统率人类文化的整个遗产，来观察我们人类面临的整个世界。

文艺学、美学必须建立新的系统观

文艺学、美学要想更科学地解释艺术现象和人类的审美现象，必须放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来提出问题、理解问题、解释问题。这个新的系统观应该说有两个特征：

第一，应把文艺学美学问题，把每个具体的文艺现象、审美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的总的背景上来理解，放在人类发展大系统中来解释。人类的审美文化现象只不过是人类发展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这个子系统中又有其本身的子系统，以此类推。

第二，这是一个审美文化系统。如果把审美现象或艺术现象作为一个系统来看，我们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比如说应对其各组成部分，它的内在结构，它的各个层次、不同侧面，它的每一方面的组成、结构、功能，进行分析，这叫作对系统的静态研究。进而把人类的文化现象、审美现象作为一动态的过程，作为一个四维事物的发展过程进行动态研究。弄清人类历史就一个社会整体来讲是怎样发生发展的。正如恩格斯说的，这一切都是一个过程，离开这个过程就不存在什么抽象的物质。当然，这个系统包括的内容、子系统的各个侧面是很多的。这里着重谈两点：

首先，是关于艺术的本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无论在东方与西方，前人已做过许多研究，进行过多种多样的概括。例如认为是神授的，是摹仿的，是心灵的，等等。现在国内美学界及艺术理论界看法很不一致。我们的教科书一般都是先将这个事物的本质讲出来，然后从本质出发，展开分析，组成我们的理论体系。所以本质问题大家特别注意。大体上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是对本质的一种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概括。若考察其历史，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给艺术在社会生活中找出了一个位置。但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简单化了、机械化了，我们从这样一个抽象的定义出发，往往把艺术理论讲得非常难以接受。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规定，把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它应该作为我们今天思考艺术问题的一个基础和台阶，而不应该把它看成是最后的结

论。我们应以它为出发点更前进一步，找出艺术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在以往的理论中我们常说，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其特殊性在于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据此将特殊性归结为“形象反映”，形象反映成为文学艺术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这种理论现在已引起了大胆的怀疑和探究。大家已不满足于此了，因为形象反映说的根据是“摹仿说”。艺术形象作为艺术理论的出发点显然是片面的。“形象”一词，无论是“形”还是“象”，讲的都是客观的。这种理论使我们感到有一种主体失落感，好像我们丢掉了一个东西。这个形象反映论进一步发展便又派生出工具说。有的人主张文学艺术是认识工具；有的则认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点近几年来受到大家几乎是一致的批评。因此近年来主体性被大家所注意，成为文艺界研究的中心。这是长时间失落主体性的一种反拨，一种必然的发展。那么我们寻找主体性是否回到情感表现论呢？中国的诗言志、诗缘情，到性灵说、神韵说，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情感表现论，中国周谷城先生的使情成体说是否就完善了呢？考察这一线索，就发现单纯强调主体的情、志、意、神，又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个“怎么来”的根源。因此我们研究考察艺术的本质，应考虑到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所以我比较赞成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应该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一命题来规定艺术的本质。

其次，若对艺术本质作这种思考的话，那么建立我们新的文艺学美学的理论大厦，应该从什么地方作为逻辑起点？这也是文学艺术界非常重视的问题。这个逻辑起点应该是看似简单的，然而它又包含了事物未来发展的矛盾的一切可能性。犹如生物学以细胞作为起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开始，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就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奥秘。我们的文艺学、美学理论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恰如其分的逻辑起点。李泽厚同志在研究美学的时候，起初是主张把美感作为起点，后来提出审美关系，接着又有变化。王朝闻同志把美学最简单地概括为关系学。国内一些著名学者都有自己的概括。这个东西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用中国美学遗产中的重要术语——“意境”代替艺术形象。这条道路我认为可以试一试。拙作《意境系统新探》（《文学评论家》1985年第3期）意在探索这样一条路，用意境代替艺术形

象。因为意境包含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内在矛盾，它与形象相比显然有不同的品格。有的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主张以意象来代替艺术形象，但我觉得两者有所不同，意象就我们中国美学遗产来讲一般是指意中之象、胸中之竹，意象经过艺术传达，到达艺术作品中，变成一个客观存在时，这种审美意识物态化传达以后，才能够变成意境。或许以意境作为细胞，作为研究文学的逻辑起点，可能是更合适一些。假使这种考虑还有可取之处，就可以用它来解剖我们现在所有的作品。审美意象在艺术作品中组成意境体系，其组成要素包括客体的象、事物的发展过程（我把它称之为事）、主体的情和主体的理（理解），即象、事、情、理。李泽厚讲意境，解剖意境时将意境的内在要素概括为形、神、情、理，主张用以上四个成分来研究意境，然后研究它们在不同类型作品中的不同组合。我觉着这种概括不一定太妥当。假设我们把意境作为出发点来解剖，带动整个艺术学的话，它可以说明艺术领域中的许多辩证关系，诸如主体与客体、再现与表现、真实性与倾向性、形象和变形（变形是艺术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实际上，过去讲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生活真实在艺术中已发生了这种变形，可能是写实性的也可能是理想式的，可能是象征式的也可能是梦幻式的，总之是变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一系列问题都能在此基础上得以解决。还有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以至于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发展造成的艺术发展史、继承和革新、民族化、共同美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辩证关系中得到一些解决的思考途径。当然这个问题大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这里只是一点粗浅的认识。

〔附记〕以上是笔者于1987年8月在全国民族院校文艺理论学术年会上的发言记录稿，曾由青海民族学院的同志整理发表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这篇文章的思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文中有些问题的提法带有那时的特定色彩。为了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这次收入时并未改动。实际上，从那次发言之后的五年多时间里，笔者循着这一思路进行过深入思考，也曾经结合学术界的争鸣写过一些文章，因而有些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有新的进展。其中最为重要的进展是，经过各方面的衡量比较，本